

民族政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 赵 刚

(延边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吉林 延吉 133000)

〔摘 要〕自近代中华民族觉醒以来,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体现出建构上的政治性、内容上的多元一体性和发展上的继承性特点。民族政策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手段, 在中华民族“自在”时期的民族政策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 在中华民族“觉醒”时期的民族政策赋予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民族国家内涵; 而在中华民族处于“民族—国家”建构时期的民族政策则是维护了中华民族团结友爱的大家庭。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民族政策要致力于维护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经济共同体意识、政治共同体意识和文化共同体意识。民族政策在历史时代下的不断创新才是完成上述“共同体”意识的关键。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 民族政策; 多元一体; 历史性; 时代性

DOI: 10. 3969/j. issn. 1002 - 1698. 2017. 02. 007

在当前学界, 关于“民族政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关联问题,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现行民族政策在增强少数民族意识的同时会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据此有些学者提出了我国民族政策要使“族群问题去政治化”^{〔1〕}、要制定“第二代民族政策”^{〔2〕}、要将“民族—国家”理论转变为“国家—民族”理论^{〔3〕}等等, 这些政策设计是对我国现行民族理论政策的颠覆。然而, 在 2014 年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 党中央却明确指出: “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

作者简介: 赵刚(1971—), 法学博士, 延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民族学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民族理论政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影响中国朝鲜族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政策研究”(吉教科文合字[2016]第 262 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朝鲜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政策研究”(15XMZ013)的研究成果。

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4]这就不得不让人思考我国民族政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内在关联。笔者认为,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来看,民族政策能够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但在民族政策选择上一定要结合民族问题的实际和时代特征来进行科学的制定。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特点

一般而言,关于“民族”有原生论和现代论(工具论)两种论点,人们既可以把古老的人群看成“民族”,也可以把“民族主义看成是现代化的产物和现代特征”。^[5]民族意识也是如此,既可以把民族意识看成是先天就具有的,也可以把民族意识看成是民族的自我认知模式,是后天才发现和形成的,因此,无论如何,民族意识都存在着一个让人产生和认知的过程,也即是被构建出来的过程。中华民族意识即是如此,“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6]民族意识由“自在”发展到“自觉”,需要政治和文化等多种手段,盖尔纳将其表述为“能够使人们自由沟通的符号文字文化、社会成员和可接受性”,^[7]安德森则认为“是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重合”促成了民族意识的起源。^[8]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也是与民族符号、政治运动和文化宣传等分不开的,在时间上,它是在鸦片战争后,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华各民族构建出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后,就与国家、主权、领土结合起来,由此进入到国家进一步构建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这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9]纵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和国家对其的建构历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建构上表现出“觉醒”上的“政治性”、内容上的“多元一体性”和发展上的“继承性”特征。

其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觉醒”上具有政治性建构的特点。

一般地说,“民族主义是一种社会建构”,“民族主义主要关涉政治范畴”。^[10]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是与政治权力、政治秩序、政治组织相关联的。首先,“中华民族”的族裔符号是由政治精英人物构建出来的。最初是由资产阶级立宪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在梁氏的论证中“中华民族”有时指代汉族,有时又是指中国的所有民族。在其后立宪派的杨度用“文化”来识别“民族”的边界,他把中华民族归之为文化族名。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章太炎把“中华民族”解释为以“汉族中心”,设想汉族建国。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在排“满”革命中将“中华民族”独立建国发展为“五族共和”。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在五四运动前后也频繁地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尽管当时“中华民族”的内涵并不明确,但是这些政治精英们的讨论本身反映着“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开始走向现代”。^[11]其次,中华民族意识是与主权国家建立相伴随发展的。在帝国

主义入侵前,中国不存在现代国家观念,是用“天下主义”和“夷夏之辨”来诠释中华民族处于“自在”时期的“国家”与“民族”的整合运动。西方民族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后推动着王朝中国向近代国家转型,而要转型为近代主权国家就得唤醒“民族主义”,孙中山曾指出:“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12]孙中山将中华民国与中华民族相结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13]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华民族独立建国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发展的标志。最后,中华民族意识是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政治革命中深入人心的。梁启超说:“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也”。^[14]在近代,反帝运动激发了民族共同体独立、解放和维护自身发展的权利和尊严意识,如1913年蒙古王公在抗击沙俄时提出了“我蒙同系中华民族”的口号;^[15]在19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傅斯年)、“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杨松)、“中华民族是一个”(顾颉刚)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因此,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华民族意识空前加强的历史时期,也是“他族”“我族”辩证运动,实现“我族”认识急剧上升的历史时期。

其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内涵上具有“多元一体”性特点。

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是指代中国疆域内的所有中国人,“它所包括的五十多个民族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16]中华民族“不是把56个民族加在一起的总称”,“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17]“多元一体”既是对中华民族实体结构的描绘,又是对中华民族意识结构的概括。首先,中华民族中的“多元”意识是中华民族意识的源泉,“多元”意识不仅包括56个族体单位的民族意识,还包括56个族体单位内部的不同群体的意识(或可叫族群意识)。周星先生认为中华民族的“多元”是“一体”的前提,“在‘一体’之中,并不是绝对的同质,在族源、结构和层次上的各民族‘多元’,恰恰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创造的源泉”。^[18]差异性“多元”意识的基本特征,求“同”存“异”是构建中华民族“一体”意识的脉络和主题。其次,中华民族中的“一体”意识既是民族实体意识,又是文化认同意识,还是国族主义意识。认同中华民族是“实体”而不是“虚体”是形成“一体”意识的重心,民族实体理论认为“民族意识的实质是对自身民族生存、交往、发展的地位、待遇和权利、利益的享有和保护”,^[19]近代中国中华民族意识觉醒的过程恰恰是对民族实体理论的反映。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是实现民族实体认同的阶梯,中华民族文化是复合型文化,是多种文化杂糅的结果,“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中,各民族之间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坎坎坷坷,但最终走向多元一体,其中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在起作用”。^[20]除此之外,中华民族的“一体”意识在觉醒后被赋予国族主义意识也是重要原因,这时的“一体”意识是通过构建国族意识的整体性来实现着国家的统一性。因此,“‘中华民族’即是中国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国族’或‘文化国族’”。^[21]总之,“多元

一体”的民族意识结构,既体现了中华民族意识的整体性,又体现了中华民族意识从“多元”意识发展到“一体”意识的过程性,而这本身也正说明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可构建性。

其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历史上具有继承性特点。

众多研究都表明,民族意识具有稳定性和时代性的特征,“轻易地使一个民族改变意识是十分困难的”。但是民族意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民族意识无不带有所处时代的社会意识的痕迹和色彩”。^[22]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稳定性”既是指“自在”时期的中华民族的“一体”意识会延续到“自觉”时期,甚至延续到现在和将来。此外,“稳定性”还是指中华民族的“多元”意识也会自古到今的延续,这些延续的“多元”意识既包括能够促进民族发展和民族关系协调“正能量”的民族意识,也包括那些可能会影响到民族发展和民族关系协调的“负能量”的民族意识。虽然民族意识能够延续,但是每个时代都会产生基于那个时代和反映客观存在着的民族发展变化的民族意识。中华民族的“一体”意识在反帝国主义时代下得以“觉醒”,在表征上主要体现为团结御辱和中华民族要成为“一个”。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华民族的“一体”意识更多地改变为如何发展自己,要求经济进步的意识更为强烈。中华民族的“多元”意识一直以来都以强化本族群(汉族、蒙古族、藏族等)的族体意识为主要表征,然而,在不同时代其族群意识也会发生改变,比如东北跨界移居的朝鲜族,在1949年之前,朝鲜族移民认同的是“朝鲜半岛是老家”;1980年代之前中国朝鲜族形成了“家乡朝鲜”的认同;而在1980年以后中国朝鲜族形成的则是“韩国是故国”的认同。^[23]在某种意义上,民族意识的“时代性”是对“稳定性”的“修正”,它会使得民族意识朝着更有利于民族更美好前途的方向发展,但是,有时民族意识也会在时代的影响下出现历史性倒退,比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些族群的独立意识已经淡化,然而在当前的世界民族主义浪潮下,个别族群的独立意识又有所增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特点,突显了中国政治力量的重要性。从王朝国家到近现代国家乃至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解、调控,影响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走向。中华民族作为复合型民族,民族意识的核心内容是“多元一体”,这将存在长久的历史时期,而且历史上的民族意识会以稳定性和时代性的表征延续到现在,因此,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调控始终存在着对“一体”民族意识的时代创新和对“多元”民族意识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二、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民族政策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后,中国政治力量对其的构建,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一步被人们认同的关键。中国政治力量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手段是民族政策,“这里所说的民族政策,是指国家的民族政策。就总体而言,国家的民族政策是国家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手段和方式。”^[24]民族政策在调

整民族关系时都是基于一定的民族理论而形成,而民族理论都是“从阶级根本利益出发,按照不同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解决民族问题”。^[25]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自在”发展到“自觉”的整个时期都是如此。

首先,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处于“自在”时期的民族政策促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多元一体”结构。

在中国古代,统治阶级形成的是“夷夏有别”和“天下主义”的民族思想和国家思想。在民族观念上信奉“夷不乱华”“先华夏后夷狄”。在国家观念上,追求“大一统”。自秦朝统一以来,“无论哪一个‘族类’群体入主中原,都会承袭、认同和维护大一统体制”。^[26]基于这样的民族和国家思想观念,古代中国在历朝历代都会注意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从实际出发,因势利导,施行不同的政策,其政策的特点是:“开拓性、怀柔性、羁縻性、同化性、因俗性”。^[27]羁縻性因俗而治是中国古代民族政策的总方针,这种政策对中华民族的“一体”和内部“多元”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中国古代民族政策承认了华夏族(汉族)与少数民族,及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他者”,为他们之间的交流和共存提供了基础,这在客观实际上有助于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其次,中国古代民族政策蕴含着强大的“大一统”国家(天下)观念。“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在这一观念下任一中央政权都会千方百计地将力所能及的领土和子民纳到自己的“天下”和“君臣”序列之中,这就造成华夏族(汉族)与少数民族虽然有别,但相互离不开的观念已然形成,这是中华民族由多元形成一体的重要原因。当然,中国古代民族政策也存在着一些不利于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杂质”,主要是大民族主义思想所产生的歧视性民族政策,民族压迫和民族剥削是古代民族政策不可避免的历史“糟粕”,它反向性地造成各少数民族都会皆力维护本民族共同体,使各少数民族的族群意识增强,然而,这种少数民族族群意识的增强,并不能掩盖古代民族政策调整民族关系的主流方向,那就是形成各民族相互交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其次,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处于“觉醒”时期的民族政策赋予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国家内涵。

在近代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和“天下主义”民族观,逐步让位给了“一族一国”“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西方民族理论。严复、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汪精卫、孙中山等政治精英将“西方经典民族形成理论的中国化”,^[28]为我们带来了“保国保种”“爱国爱种”的思想意识,“建立复合种族(汉种、满种、蒙种等)之国还是建立单一种族(汉种)之国的两种论争,成为近代中国民族论的争论焦点”。^[29]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宣布“五族共和”,确立了“复合种族”建国的基本原则,虽然后来多有争论,但是,民国成立以来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更多地倾向于多民族“共和”建国,这时“中华民族”越来越具有包含各民族的内涵。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民族政策起到了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的作用。首先,在中国各民族关系上,民国历届政府都制定过民族平

等政策,其中,1924年广州革命政府制定的“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30]被国共两党所代表的社会各界广泛认同。其次,在民族与国家关系上,民国历届政府都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孙中山制定了22行省外加内外蒙古、西藏、青海联合建国方案;蒋介石制定了“五族联邦”方案;中共制定了由“民族自决”“联邦制”发展到“民族区域自治”的建国方案。再次,在中国各民族的前途问题上,孙中山提出过“振兴中华”的目标;蒋介石提出过“民族复兴”口号,构建了由“家族—宗族—中华民族—国族”的宗族观;中共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中华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是中共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最后,在中国各民族实体问题上,民国历届政府都制定过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的政策,允许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和发展本民族教育事业,中共在根据地和解放区也贯彻着这样的政策。通过上述四大类的民族政策,致力于维护国家和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意图充分显现,中华民族独立和建立主权国家伴随着中华民族“自觉”的历史进程。

最后,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处于“民族—国家”整合时期的民族政策推动了中华各民族友爱合作大家庭意识的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共同体进入到完全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整合的历史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多民族国家必须“将组成多民族国家的各个民族维持在统一的国家政治共同体中和巩固、强化各个民族的政治结合”。^[31]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想进行这种“政治结合”,就得面对“中国拥有漫长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承认多样的国家意志”和民族意志。^[32]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正是把民族感情和社会主义国家结合起来的政策,^[33]这种政策“是为了经过民族合作、民族互助,求得共同的发展、共同的繁荣”。^[34]新中国民族政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首先,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力主“合”而不是“分”,这顺应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自古以来“一体”意识的历史趋势。民族区域自治不同于“联邦制”,也不同于西方的“保留地”,它是打造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政治基础。^[35]其次,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通过“差别化”政策措施来实现“一体化”,这符合中华民族是由“差别”的多民族经过“杂糅”达到“一体”的发展规律。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差别化”政策措施(又可称为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蕴含的平等价值、人权价值、正义价值和秩序价值,使我国各民族的“和谐表征为民族差异性得到承认,利益诉求的多元性受到应有尊重,各民族群体及其成员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和实现,‘多元一体,和而不同’成为一种现实可能”。^[36]最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能够对中华民族内部的“多元”民族意识以引导,因为我国民族政策既反对大民族主义,又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行是为了“各民族完全平等和自愿联合”,^[37]在无产阶级专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族的民族意识中会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对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共产党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

然而,任何事物皆有两面,当我们看到了自古以来的民族政策能够推动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的同时,也应看到民族政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产生抑制的一面,比如,在中国古代,“各民族之间特别是统治者和被统治民族之间,如果能平等相待,相互尊重,民族之间就能和平共处,社会就能稳定,政治就能得以巩固;反之,如果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则会出现族群的分裂和对抗,社会就一定会出现战争和动荡”。^[38]就是现当代中国的民族政策也是如此,近些年来有些学者非常坚定地认为,我国民族政策会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例如,周平教授就认为:“‘民族主义’取向的民族政策势必强化各民族的民族意识。我国的民族政策从同情、关心、帮助少数民族的价值取向出发,不断地重申和强调少数民族的权益,无形中也就强化了民族的概念和意识”。^[39]言外之意是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增强会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周平教授建议要将民族政策的“民族主义”价值取向更改为“国家主义”。殊不知,即使是更改为被称之为“国家主义”的民族政策,在某些时候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增强也是不可避免的,之所以如此,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政策之间既有相关性的一面,又有独立性发展的一面。在民族国家时代,如果追求二者之间的协调,就必须正确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历史性与时代性问题。

三、从历史与时代的统一中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政策的辩证关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政策皆有历史性与时代性问题。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和国家理论“不仅仅限于解释过去,而且大胆地预察未来”。^[40]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继承“过去”的前提下,日益表现为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经济共同体意识、政治共同体意识和文化共同体意识,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也不能局限于解释过去的中华民族问题,也应勇敢地时代的创新中来“预察”中华民族的未来。

第一,为巩固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意识,民族政策应该继续体现承认“多元”与维护“一体”的统一。

“命运共同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水乳交融,唇齿相依之意。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和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在近代“血”与“火”的洗礼之中,让各民族人民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在结构上表现为“多元一体格局”,在民族意识上是“共休戚、共存亡、共荣辱、共命运的情感和道义”,此外,也是平等互信的民族关系意识、凝聚共同利益的经济交往意识和包容互鉴的文化交融意识。在我国民族政策中,充分体现和维护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民族政策主要是指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尊重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力主各民族的“合”,而不是“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将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相结合,将国家统一与民族自治相结合,它实现着中国最广大人民和 56 个民族的共同心愿。

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要想更好地发挥维护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就必须正确处理好国家治理与民族自治的辩证关系,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面前,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属必要,特别是实行区域自治民族的自治权在国家政令统一、国家管理一体化诉求下极易被否定、被忽视,我们说中华民族结成了命运共同体,但不等于说各民族之间差异的消失,恰恰相反,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更要注重“民族”所赋予人群之间的差异,因此,“求同存异”“和谐共生”才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正途,为此,要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运行机制,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要制定好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完善维护民族区域自治的各项法律措施,从而实现通过法律体系来维护“多元”和谐的目的。要通过民族干部培养和使用机制来发挥少数民族的自治权,要建立起少数民族干部与汉族干部双向交流机制和岗位轮换机制。实践证明,国家的各民族干部作为国家建设的精英,增强他们的中华民族自豪感对维护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至关重要。

第二,为巩固中华民族的经济共同体意识,需要继续发挥帮助性民族政策的作用。

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形成,是“历史上汉族凭藉其在经济和文化上比较国内其他各族为先进的优势,已经长期深入到其他民族聚居的区域,建立了沟通各民族的经济渠道……,逐年累月地把各族捆成一个高层次的共同体”。^[41]历史上汉族长期占据中原,经济发展较快,少数民族被迫退居边疆,经济发展落后。依据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原则,社会主义中国必须“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态”,^[42]“我们要帮助各兄弟民族的繁荣”,“我们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的政策,^[43]因此,帮助性民族政策是社会主义中国维护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的重要举措。

当前,中华民族经济共同体意识仍然是以共同繁荣为核心,但在现阶段尤其表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问题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程上,我国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仍然存在,而且越来越呈现出民族性与区域性相交织的特点,这就要求改变以往不加区分地以特定民族来施行民族政策优惠的做法。帮助性民族政策在实施中要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在民生、扶贫、环境等问题上,应用区域性帮助政策来代替民族性帮助政策。在少数民族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文化产业上,还须保留以民族划界的优惠扶持政策。实践证明,我国帮助性民族政策对推动落后民族地区的快速发展意义重大。国家通过帮助和扶持使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快速发展起来,能够增强少数民族与汉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不使任一民族产生被遗忘之感,使各民族共同感悟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这有利于少数民族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在现阶段有些人主张取消帮助性民族政策和认为帮助性民族政策已经过时的论调是错误的。

第三,为巩固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体意识,民族政策必须继续彰显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以来,中华民族就是指取得了民族国家形式的民族(nation),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与中国的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分割的整体”,^[44]此时,中华民族已上升为国家民族,这是中华民族的政治属性。中华民族作为“政治共同体”是与国家主权、领导阶级、执政党,以及社会发展道路等政治符号紧密相关的。随着中国阶级革命的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就使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应有之义,因此,增强中华民族成员对伟大祖国,对中国共产党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就成为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发展意识。

我国民族政策在宗旨上必须要增强中华民族成员对伟大祖国、对中国共产党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然而,在当前却有很多人认为我国民族政策在实践上恰恰是弱化了这些方面的认同,力主将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由“民族主义”调整为“国家主义”。笔者认为,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不能严格区分哪是取向“少数民族”,哪是取向“国家”,因为,只要说一项政策是民族政策,那么它必然是承认民族差异,而承认民族差异就必然是“优待”少数民族,此外,民族政策都是国家制定的,它的本意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稳定,因此,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不能简单地划分为“民族主义”或是“国家主义”。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应是社会主义,^[45]因为,社会主义是我国的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是社会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行动规则,只有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民族政策才能被社会主义国家所制定,才能被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所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所强调的,“党的民族理论和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是正确的”和“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种说法可以休矣”,^[46]即是对我国现行民族政策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肯定和注解,因此,充分彰显我国民族政策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对维护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四,为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共同体意识,民族政策必须继续推动各民族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中华民族是一“文化共同体”,中华文化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由各民族文化构成的中华文化,既是中华文化的历史沉淀的结果,又是中华文化不断升华的结晶”。^[47]中华文化在现时代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时代象征,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文化,也是民族的、科学的和大众的文化。发展中华文化,在当前的时代课题是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应对思想文化多元化的挑战,在对古典文化取其“精华”和去其“糟粕”之中,不断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民族政策推动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它以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教育、语言文字和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为宗旨,使少数民族文化在社会主

义时期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在文化现代化和文化全球化面前,少数民族文化日益“商品化”和“展览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遗失的速度非常快。民族政策要改变以往物质性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的策略,要在政策上引导少数民族文化的创新,既鼓励少数民族学习和掌握现代文化,又推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形式和内容的全面创新。民族政策在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增强各民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要明确中华文化之同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之同,汉文化不等同于中华文化,那种忽视少数民族文化,把少数民族文化置外于中华文化和缺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都是错误的。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基,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构建和发展好中华民族文化,民族政策在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必须深刻把握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新特点,继承与创新、繁荣与进步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题,也是民族政策推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主题。

四、余 论

用民族政策调控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只是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种手段中的一个方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指出:“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48]这就是说我国的民族问题是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国家的各方面问题都与我国的民族问题息息相关,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各方面建设都会影响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这一思路出发,有时我们不能过分“苛求”民族政策对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作用,如果你只看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你就会对民族政策“百般挑剔”,所谓“国民一体化”就会成为你的主张。如果你只看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你就会千方百计地要求民族政策的“照顾”,甚至否认中华民族的存在。而这两种极端论证的调和点只能是用历史和时代的视角去看待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民族政策的辩证统一,既不能对二者进行割裂,也不能对二者进行互否。

注释:

[1] 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2] 胡鞍钢、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3] 张继焦、尉建文、殷鹏、刘波:《换一个角度看民族理论:从“民族—国家”到“国家—民族”的理论转型》,《广西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4][46] 丹珠昂奔:《沿着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前进》,《中国民族报》2014年11月7日第5版。

[5][7][英]爱德华·莫迪默、罗伯特·法恩:《人民·民族·国家——族性与民族主义的含义》,刘泓、黄海慧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9、54页。

[6][16]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8][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坚人译,上海人民出

版社,2005年,第38页。

- [9][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李金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页。
- [10][美]迈克尔·赫克特:《遏制民族主义》,韩如颖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页。
- [11][20][47]徐杰舜、刘冰清、罗树杰:《中华民族认同论》,宁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5、94、304页。
- [12]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210页。
- [13]魏新柏:《孙中山著作选编(上)》,中华书局,2011年,第158页。
- [14]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34-35页。
- [15]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 [17][41]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 [18]周星:《关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学术评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4期。
- [19]金炳镐:《民族理论通论(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12页。
- [21]柏贵喜:《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浅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1期。
- [22]遯广斌:《民族意识初探》,《黑龙江民族丛刊》1991年第4期。
- [23]金焯:《朝鲜族族群认同的变化》,《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18期。
- [24]周平:《民族政治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85页。
- [25]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马恩列斯论民族问题》语录编选组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135页。
- [26][32]郝时远:《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4、137页。
- [27]徐杰舜:《关于中国民族政策史的若干问题》,《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年第2期。
- [28]张淑娟:《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民族理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160页。
- [29]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鲁忠慧译,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42页。
- [30]魏新柏:《孙中山著作选编(下)》,中华书局,2011年,第656页。
- [31]周平:《多民族国家的族际政治整合》,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50页。
- [33][34][43]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154、177、179页。
- [35]王希恩:《也谈在我国民族问题上的“反思”和“实事求是”》,《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1期。
- [36]雷振扬等:《社会转型期民族政策专题研究》,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171页。
- [37][42]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72、516页。
- [38]韦良云:《中国古代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特点》,《才智》2013年第33期。
- [39]周平:《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及我国民族政策价值取向的调整》,《学术探索》2002年第6期。
- [40]王希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民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18页。
- [44]陆海发:《民族国家视阈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 [45]赵刚:《试析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价值取向》,《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 [4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责任编辑:刘姝媛]